

思維的悲劇與悲劇的思維

——
傅胡同思想研究

黃 衛 平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思维的悲剧与悲剧的思维

——谭嗣同思想研究

黄卫平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鸣琦

封面设计：周凯

思维的悲剧与悲剧的思维

——谭嗣同思想研究

黄卫平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印刷：江西省上饶师专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5 字数：110,0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

ISBN 7-5415-0266-9/K·5

定价：1.95元

目 录

序	肖 薏 父 (1)
绪言	(6)
第一章 谭嗣同思维悲剧的衍变	(9)
第一节 始拘于传统辩证法的形而上学	(10)
第二节 继承王夫之的朴素唯物辩证法	(15)
第三节 终发挥佛道思辩理性的相对论	(20)
第二章 谭嗣同《仁学》的思辨体系	(26)
第一节 《仁学》的体系结构	(27)
第二节 《仁学》的哲学世界观	(33)
第三节 《仁学》的政治伦理观	(40)
第四节 《仁学》的思辨逻辑	(46)
第三章 谭嗣同思维悲剧的反思	(59)
第一节 谭嗣同的辩证法意味着什么	(60)
第二节 谭嗣同的相对主义价值何在	(72)
第三节 谭嗣同思维悲剧的历史比较	(81)
余论	(88)
附录一 关于哲学上唯心主义问题的若干思考	(91)
附录二 谭嗣同思想研究综述	(115)
附录三 参考论著目录	(134)
后记	(137)

序卫平论壮飞思想悲剧书

肖楚父

我辈虫吟真碌碌，高歌《商颂》彼何人。
十年醉梦天难醒，一寸芳心镜不尘。
挥灏琴尊辞旧岁，安排险阻著孤身。
乾坤剑气双龙啸，唤起幽潜共好春！

《和仙槎除夕感怀四篇》之一

谭嗣同这首诗，存于《三十以前旧学第二种——莽苍苍斋诗卷第二》中，未系年，以其行迹推之，当作于光绪二十年甲午除夕（当一八九五年初），时年二十九岁。这首诗写作的动念和激情显然来自甲午中日战争清廷惨败之后的时局，正如稍后不久的另一首《有感》所诉：“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深重的民族危机，促使青年谭嗣同猛醒，由一个“守文因旧”的书生迅猛地转变为呼号变法的志士。诗中，反映了他对自己过去青春岁月的严肃反思，虽然芳心不染而毕竟碌碌无为；表露了他对未来道路的自我选择和为了革新救亡而决心不避险阻、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次年春，谭嗣同到了北京，与梁启超、康有为、翁同龢等相结识，从此参加维新运动，著《仁学》，办《湘报》，奔走呼号，投身激流，冲决网罗，义无反顾，直到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失败后慷慨就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的就义，既慷慨，又从容，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历史的使命感。戊戌政变突发，他拒绝走避，坦然向朋友们说：“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各国变法，无不

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一片洋溢着爱国热忱的激越心声，连同他闪光的一生（年仅三十三岁）及其彗星般的思想光芒，曾经唤醒並激励过中国走出中世纪艰难岁月中多少前仆后继的爱国志士；透过九十年间的神州风雨，迄今仍未丧失它的感染力。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作为新一代真正觉醒的启蒙者，在政治思想上激进的民主意识，对“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的愤怒抨击和猛烈批判，使他成为戊戌一代维新志士中独立不苟的佼佼者；在政治实践上，表现出特有的高风亮节，以沉肃的忧患意识所辐射出的炽热爱国情操，燃烧到最后，自觉演出一幕“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政治悲剧，赢得了千百万后人一致的哀悼、崇敬和衷心礼赞。

但是，有关谭嗣同以《仁学》为代表的哲学思想体系，在学术界的理解和评价上，则存在着较多的分歧，或褒扬、或贬抑，或泛观、或深求，都各有其思想基准和价值取向。声气相投的同辈知交，如梁启超，将其比作晚清思想界的“彗星”，认为“《仁学》内容之精神”正如“英奈端(牛顿)倡‘打破偶像’之论，遂启近代科学，嗣同之‘冲决网罗’，正其义也。《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真可谓极大胆极辽远之一计划。……其尽脱旧思想之束缚，戛戛独造，则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七）康有为则赞之以诗曰：“大哉《仁学》书，勃擎天为惊！金翅来大鹏，溟海掣长鲸，巨力擎烛龙，雷霆吼大声。吾道有谭生，大地放光明。……”（《六哀诗之四》）这些赞扬之词，或不免以神交心许而有所溢美，但足见谭嗣同思想在当时人心目中的直接印象。此后，对谭嗣同思想的研究和

评析,褒贬不一,偏全各异,见仁见智,歧解甚繁。而在较长时间内一些论者拘于对“仁”和“以太”、或“以太”与“心力”之间关系的不同诠释,徘徊于对谭氏哲学基本性质的争论;或基于谭氏思想主要来源于佛教哲学或主要来源于王船山哲学,从而评判其理论价值;或者进而注意到谭氏思想有其曲折的衍变过程而又有其最后的政治归宿和哲学归宿,同时也注意到谭氏思想各方面都充满着复杂的矛盾而又有其试图统一各种矛盾的未臻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基础。至于对谭氏哲学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有的论者认为其体系虽未成熟,但标志着中国古典传统哲学的终结;有的则认为其《仁学》体系虽庞杂,但主要是近代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的一个雏型;有的论者虽肯定其冲决封建网罗的巨大历史作用,但认为就其哲学仅是从“旧学”向“新学”转变中一种特殊的形态而论,其充满矛盾的体系正表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一次流产。

在这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黄君卫平好学深思,经过认真钻研,反复琢磨,写成了《思维的悲剧与悲剧的思维》一书,着重从思维方法的角度,论述了谭嗣同思想的政治取向及其哲学方法论基础的历史衍变过程,系统剖析了《仁学》中由政治伦理思想、哲学世界观与主观思辨方法三个层面所组成的理论逻辑结构;较深入地揭示了《仁学》所阐述的“辨对待”——“破对待”——“无对待”的矛盾观;“柔静之与刚动异”——“静则将以善其动”——“动即静,静即动”的动静观;以及“网罗重重”——“冲决网罗”——“冲决网罗即未尝冲决网罗”的自由观等逻辑进程;指出这一思辨序列的逻辑进程具有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乃是涵容並歪曲了辩证法的相对主义;而这种相对主义诡辩,在当时却具有否定封建教条,冲破“独断迷梦”,促进思想启蒙的特定历史作用。书中这些颇有新意的独到之见,表明作者的致思趋向,不囿成说,不拘公式,不迷

于表层现象，而着力于思想的深层结构及其功能的剖析，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臬，而又十分注意论史结合，言必征实，立论皆铮铮有据。因而本书并非陈陈相因之作，而是近些年谭嗣同思想研究中确有创获的新成果。

本书尤具特色是第三章，作者在论史结合的前提下还坚持了中西对比与古今贯通的治学原则，把对谭嗣同思维方法的评析纳入了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与西方传统的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相比较，与西方（尤其德、俄）在近代发展起来的辩证思维方法相比较，从而较深刻地揭示了以谭嗣同为典型的中国近代思想家在思维模式及思维方法上的固有特点，即往往未能超越朴素辩证法的传统，并依靠这种传统思维模式来融汇涵化西方形式逻辑和现代科学成果，导致中国近代许多哲学家的思维，既不是夸大了形式逻辑而陷入形而上学，也不是超越形式逻辑而达到了辩证逻辑，却是更多地表现为主观地运用辩证法而通向诡辩术。在谭嗣同的《仁学》体系中，即表现为“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奇妙结合”，“对西方形式逻辑的不自觉的歪曲”。作者指出：这正是谭嗣同思维方式的悲剧。作者有分析地作出结论：谭嗣同思想“通过特定的思辨逻辑紧紧地围绕着他的政治主题，具有强烈的政治鼓动性和主观随意性，极大地冲击着几千年来封建正统观念，却未能突破传统的运思习惯，它开辟着中国哲学与近代科学相结合的广阔前景，却又使这种结合陷入外在的比附而误入歧途；他自觉地试图引进一种与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大相径庭的形式逻辑，却又不自觉地将其纳入传统思维的固有模式；他继承着以王夫之为最高代表的朴素辩证法的思维传统，却又以极端的逻辑诡辩而标志着它在近代的瓦解。可见，谭嗣同思维方法的革命性本身就是他的思维方法的时代悲剧。因此，与黑格尔、赫尔岑等人相比，谭嗣同等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也许可以说他们是本世纪历史的同时代人，而不

是本世纪哲学的同时代人；他们在实践上已达到的阶梯，在理论上还没有达到”。这种通过中西比较、古今贯通所得到的分析结论，是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说服力的。作者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论点为指针所作的关于德、俄、中三国近代具有启蒙意义的哲学思潮的对比研究，在方法论上也有着多方面的启发意义。至于在书末《余论》中，作者深体鲁迅先生“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之诗意，提出了一些十分严肃而又具有前瞻性的课题，诸如，从谭嗣同思维方法的时代悲剧去批判地总结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消化西学中的历史教训问题；从谭嗣同为代表的近代哲学启蒙思潮的特点去科学地考察辩证法在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从现代科学概念向东方古代哲学复归的趋向中去冷静地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问题……等等，作者经过深思提出的这些课题，的确是时代脉搏的反映，在当前文化问题的探讨中，不是也值得本书作者和广大读者进一步去深入思索么？

黄君卫平，以上海知识青年下乡，曾耕读于黑龙江畔，青龙山下；八十年代初考取研究生，来学于珞珈，矻矻三年，不骛声华，好作深沉之思，喜读壮飞《仁学》诸书，且景慕其为人，常慷慨论百年来中国改革道路之坎坷，而论及谭嗣同等的政治悲剧和思想悲剧，遂以此为主题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颇得到师友好评。毕业后到深圳大学工作，虽颇历崎岖而初心不改，除瘁力于教学和科研的创新开拓外，仍在学位论文的基础上锲而不舍地充实、扩展而成此新著。黄君等毕业时，余在赠诗中曾有“海底鲛珠偏似泪，火中鸣凤最关情”句，今喜其不弃旧业，敏求新知，火凤初翔，鲛珠成串，故乐为之序，盖庄生所谓“薪火相传，不知其尽”之意而已。

一九八九年七月序于汉皋

绪 言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①这掷地有声的铿锵语言和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唤醒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代爱国志士，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为民族的复兴和解放而奋斗，谭嗣同的英名早已深深地铭刻在我们民族走向近代启蒙的历史纪念碑上。

当命运之神再次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去思考与当年谭嗣同等人“救亡图存”相类似的“球籍”问题时，当改革与开放、挑战与选择已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标志之际，重新去研究谭嗣同这位伟大的改革先驱，从新的历史视角去探索当年维新志士的思想与实践的悲剧，也许能另有启迪。

谭嗣同作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也是戊戌维新运动中最富于思辨理性的哲学家，他以《仁学》为代表的思想体系，既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光辉，又留下了理论思维的教训；他在政治舞台上以非凡的举动和英勇的气魄，形象地演出了一幕资产阶级维新激进派“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历史悲剧^②，在理论思维中则以他极为庞杂的世界观和思辨方法，抽象地体现了晚生而早熟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急于“冲决网罗”，又“未尝冲决网罗”的矛盾性格^③；他以近代知识分子精英与朝廷官僚贵族子弟的双重身份，依托光绪皇权而跻身于维新运动的权力中枢，却最终

①引自梁启超《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第546页，中华书局1981年增订本。

②谭嗣同的临终语，《谭嗣同全集》第287页。

③《仁学》自叙，《谭嗣同全集》第290页。

残死于封建专制体制的屠刀之下；他是戊戌维新变法的不朽殉难者，又是中国近代启蒙的伟大思想家。

近百年来，考订谭嗣同事迹和研讨谭嗣同思想者不在少数。尤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国学术界致力于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研究谭嗣同思想，在本世纪50至60年代曾展开过颇为热烈的争论，取得不少学术成就。现在多数学者都肯定谭嗣同思想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注意历史地剖析和评判谭氏哲学的发展性质，基本上都认为《仁学》这一充满矛盾的思想体系的主要倾向是唯心主义的，但是，对于谭嗣同思维逻辑中的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矛盾问题，以及谭氏思想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的地位问题等所作的评判上，学术界尚有较大的分歧*。为此，笔者想由这两个问题为线索，以思维逻辑为参照系，联系谭嗣同的具体思想，重新研究其思维悲剧，并由此而宏观地论及我们民族在近代启蒙中的思维悲剧。

所谓思维逻辑，广义地说，是与一定的世界观相一致的方法论，狭义地说，是思维过程中形成概念、作出判断和进行推理的逻辑方法。由于不同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不同民族的理论思维亦往往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因此，联系具体的思想内容来分析抽象的逻辑形式，以思维方式作为“参照系”，是衡量一个哲学家在理论思维发展中所处历史地位的重要尺度。尽管并非每个哲学家都曾自觉地意识到或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思想方法与逻辑形式，却总是不可避免地在他的理论思维中运用某种逻辑方式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或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这就需要我们从一个哲学家的论著中去发现特定的思维方式和逻辑形式，探讨由特定的思维形式和具体的思想内容所构成的理论系统所特有的结构与功

*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研究状况，参见附录二，《谭嗣同哲学思想研究综述》

能,这对于评判一个哲学家理论思维的历史价值,具有不可忽视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东方农业大国,是在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之下,被迫面对近代工业文明的,这就决定了我们民族走向近代的历史进程是与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意识紧密相联的,由此,也就形成了一个颇为矛盾,而又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要救亡图存,御列强于国门之外,就必须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意识,提高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要振兴中华,又必须接受中国在近代落伍的严峻现实,自觉地对外开放,经受源于西方的近代民主制度、商品经济和工业文明对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的全面挑战,向西方学习,走向近代化。这双重历史使命使中国近代以至现代史走上了极为坎坷的道路,同时也使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和哲学变革长期处于悲剧之中。而谭嗣同所处的时代则正是中国古代哲学开始向近代思维转化,传统的中国儒、释、道“三位一体”,互补互渗的文化结构受到孕育了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强烈冲击之后,中国思想界被迫作出反应和选择之际,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极好契机。谭嗣同作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以他的《仁学》一书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作出了不同凡响的回答,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深深地影响了一代爱国青年和志士仁人,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民族在特定时代中,新旧杂陈、方生未死的思维特征。当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思考在东西方文明的全面碰撞、交融中,在我们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征途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关系时,谭嗣同曾经作出的选择,无疑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章 谭嗣同思维悲剧的衍变

中国近代是个新陈代谢变化急骤的变革时期，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使“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极为严肃的问题紧迫地摆在整个中华民族面前。挑战与选择，刻不容缓，不同阶级的思想代表和各个阶层的知识精英分别从各种精神武库中寻觅理论武器，从不同的思想遗产中探求救国良方，企望历史能够朝着最符合自身价值定向的前景发展，一时间古今中外各种思潮汇聚激荡，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景象。

然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的活动，虽然都是有自觉意图和预期目的的，但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从来不是由某种意志所左右的，当人们试图按照各自的利益需求和价值目标创造历史时，历史也正在以它无情的进程筛选着人们。迅速变幻的时代风云，纷至沓来的社会思潮，使近代史上许多人物的思想曲折多变，固然不乏紧紧追随历史步伐前进的出类拔萃之辈，却也有不少曾风流一时而很快就被历史洪流所淘汰的人物。

谭嗣同则是一个“以日新相期”的时代弄潮儿^①，他诞生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余烟未尽之时，生长于洋务事业方兴未已之际，而最终成熟于甲午战争的风云突变之后。从流连于辞章诗赋，迷茫于科举仕途，到惊醒于甲午炮声，激进于维新运动，在他短短三十三年生涯中，走完了从封建官僚贵公子到资产阶级维新激进分子的曲折道路，并在思想上迈向了革命民主主义。他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现了“誓向沙场为鬼雄，庶展怀

^①《谭嗣同全集》第228页。

抱无蹉跎”的豪情壮志^①，满怀悲愤地呼吁开辟一条流血变法的新途径，实际上否定了仅仅依靠维新君主自上而下地实行和平改良的可能，充分表现了“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②

已有不少学者论述过谭嗣同一生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过程，笔者认为谭氏在理论思维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也与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世界观一样，有一个衍变过程；而《仁学》的思辨结构正是这一过程特定阶段的产物。正如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因此，有必要在分析《仁学》的思辨结构前，先考察一下谭嗣同思维方法的历史衍变。

第一节 始拘于传统辩证法的形而上学

谭嗣同于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公历3月10日）诞生于一个由科举进身的湖南浏阳籍的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幸承家训”^③，“五岁受书，即审四声，能属对。十五学诗，二十学文，”^④“蚤为旧学所溺”，^⑤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却很少有可能接触西方近代文明。他也和当时大多数封建士大夫子弟一样，早年曾沿着父辈们走过的科举仕途攀援，“自束发治经学，好疏析章句，”^⑥“受书以来，未尝不

①③④⑤⑥《谭嗣同全集》第66、8、55、259、52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4页。

*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于1859年（咸丰九年）考中进士，以后官阶累迁，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升至湖北巡抚，成为满清王朝的封疆大吏。

培其有用之精力，殚心镂肝，昕夕从事，以薪一当”^①，以至他在三十岁之前，“十年中，六赴南北省试，几获者三，卒坐斥。”^②

这种热衷于“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③又多年准备科举考试的生活，使他对当时“中外是非得失、全未缕悉”，^④在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上都十分保守。如果说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曾使康有为的思想产生飞跃，*并以一八八七年初步编成的《人类公理》为标志，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那么，谭嗣同在一八九〇年以前所撰写的《治言》和《记洪山形势》二文仍持有较迂腐的传统观念。**

首先，谭氏戴着“夷夏之辨”的有色眼镜看待十九世纪后期腐朽的中国封建统治与资本主义列强的关系，断言“今之中国，犹昔之中国也，今之夷狄之情，犹昔之夷狄之情也。”^⑤

其次，谭氏坚持“质文递禅”的循环史观，以为近代中国屡败于西方列强是恰逢“夷狄之由忠而质，且向乎文，而适当乎华夏之文胜质不存也。”^⑥

再次，谭氏信守“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传统的伦理政治信条，认为中国人只要能“中心而尽乎己”就能从“文胜质不存”而“反之于忠”。^⑦

基于这样的认识，谭嗣同早年反对“见外洋舟车之利，火器之精，刳心殚目，震悼失图”，^⑧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颇不以为然，认为，“夷狄之富，不足以我虚；夷狄之强，不足以我孤；夷狄之愤盈而暴兴，不足以我徂；夷狄之阴狡而亟肆，不足以我图。”^⑨这在当时远较封建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的

①②④《谭嗣同全集》第17、17、231页。

③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全集》第546页。

*参见卞柏林著《康有为的哲学思想》第10页。

**参见徐义君《谭嗣同著作写作年月考》，载《谭嗣同思想研究》。

⑤⑥⑦⑧⑨《治言》，《谭嗣同全集》第236、233、235、236、233页。

“中体西用”论和“变器卫道”论更落后于时代潮流，而与封建顽固派的论调相去无几。与此相应的是他在思想方法上强调“立本以趋时，居易以俟命”①，“变者日变，其不变者，亦终不变也”。②

谭嗣同显然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传统，他承认世界充满着运动和变化，肯定社会历史经历着动荡和变革，意识到当时中国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之际，面临自“夏后氏”和“秦”以来的第三次变革。然而，他却割裂了事物及其过程的变动性与常住性的辩证统一，在他看来：“立中国之道，得夷狄之情，而驾驭柔服之，方因事会以为变通，而道之不可变者，虽百世而如操左券。”③“变者日变，其不变者，亦终不变也。强变者不变，持之断断，且卒不能无变，况强不变者变哉。余谓毋遽求诸变也，先立天下之不变者，乃可以定天下之变。”④

且不论谭氏所谓“不变者”，无非是指作为“华夏”之特征的“风教礼俗”、“三纲五常”之道⑤，仅就“变”与“不变”的抽象关系而言，谭氏注重的是，“变”中之“不变”，他并非简单地无视运动、变化，而是在承认“变”的同时，强调万变不离其宗，“变”中固有“不变”的法则。因此，他主张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中，以不变之道“变通”地应付万变。他在《史例》自叙中也曾指出，“变者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不变者，质文损益，万变不离其宗，”“史学固然，凡学莫不然也。”⑥

谭氏的这一观念，从世界观上说，不是讲“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是认为“天变道亦不变”，就思想方法而论，是将一

①③⑤《治言》，《谭嗣同全集》第235、236、232页。

②④《记洪山形势》，《谭嗣同全集》第19页。

⑥《谭嗣同全集》第16页。

定条件下相对稳定的事物及其过程的本质、规律绝对化、凝固化，使之成为超时空的永恒法则，他只看到一定条件下运动、变化着的事物有其相对稳定的规律，看到了“变”中有“不变”，却没有认识到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是随条件的改变而变化的，无视了“不变”之道的相对性。

谭嗣同也承袭了中国传统的“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等辩证观念，但却加以主观地应用，以论证他的历史循环论，他不去具体分析近代中外关系历史性变化的客观原因，而是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衰败纳入“质文递禅，势所必变”的循环模式^①，认为：“天下惟相反至于极，其归也必相似，相似至于极，亦适得其相反。循环而运，一左一右，相反也，而卒于相遇，绕地球而行，一东一西，相反也，而卒于相遇，……相反莫如水火，而相济以为利；相反莫如刑赏，而皆为忠厚之至。”^②

抽象地说，这种观念不失为素朴的辩证法，但谭氏以此论证“华夏”之复兴不在于洋务，而在于“立本以趋时，居易以俟命”，即将中国传统的“不可变”之道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继续加以坚持，遵循“正心、诚意”的政治伦理信条，自觉地“中心”、“尽己”，以等待社会历史的“循环而运”和中外关系的重新转化，所谓“强为善者人，而成功者天。”^③

谭氏的这一观念是将矛盾双方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和客观事物的运动发展，曲解成无条件的、绝对的循环运动，从“物极必反”推出“循环而运”，从而在理论上否定了发展的思想，既论证了循环论，也导致宿命论。

上述两方面不仅表明谭嗣同早年的思维方法是从属于他保守的政治态度，而且也表明它在逻辑形式上是以歪曲朴素辩证法为特征的形而上学。这本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征之一，从

^①《谭嗣同全集》第233页。^{②③}《治言》，《谭嗣同全集》第234、235页。